

浅谈佛经翻译与《圣经》翻译的历史进程及其理论对比

牟晓芳¹, 李秀丽²

(1. 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2. 山东广播电视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在中西方翻译历史的发展进程中, 中国对佛经的翻译活动和西方世界对《圣经》的翻译历程分别体现了中西方对翻译各自的认识和理解。本文在对中西方宗教翻译历史做了简要回顾的同时, 也对二者的翻译理论进行了大致的比较, 以期从中发现中西方翻译传统的相似性及差异性。

关键词:佛经翻译; 《圣经》翻译; 相似性; 差异性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340(2009)01-0062-03

一、中西方宗教翻译活动及其翻译理论

(一) 佛经翻译与中国翻译理论

佛经翻译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翻译活动, 从公元2世纪开始, 中国开始翻译佛经。我国的佛经翻译, 始于东汉恒帝末年, 在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发展, 盛行于唐代, 北宋时已经式微, 元以后则是尾声了。

最初的佛经是这样翻译的: 首先由来自西域或印度的僧人用胡语或梵语口授, 另一人译成汉语, 记录后再做润饰。当时的译本多文字质朴, 力求保存原本面目, 且多用音译。以后有了通汉语的外国高僧和通梵语的中国高僧, 译事达到新的水平。

安世高, 西域安息国太子, 是我国有史可证的佛经翻译的第一人, 也是翻译史上最早的质派译家。他于汉恒帝建和初年(公元148年)来到中国洛阳开始译经, 在汉译佛典上独具匠心, 内容和形式都富有特色。但总的来说, 他还是偏重于直译^[1], 有些地方顺从原文结构, 不免重复、颠倒, 而术语的创作也有些意义不够清楚。

现存最早的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 一般认为是支谶的《法句经序》。序中他首先提出翻译之不易, 接着反映了早期文质两派的译学观点, 并表明自己好“文”的译学主张。

释道安(314-385), 是东晋时杰出的佛教学者和翻译家。他是著名的质派大师, 强烈主张采用直译的手法, 力求

保存原文的内容和形式。因此, 在道安时期的佛经翻译几乎是逐字逐句的死译。他还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理论。

在佛经翻译上主张采用意译的是后秦高僧鸠摩罗什(344-413), 他精通佛学又晓汉学, 再得到众多名僧的协助, 因此所译经论的质量, 不论在语言的精美上还是在内容的确切上, 都是前所未有的^[2]。罗什是文派的译经大师, 倾向于意译, 他强烈感到传达原作文体风格的必要性。

梁陈之间又有著名译家真谛(499-569)。他是西印度优禅人, 主张采用直译的方法, 认为翻译不可以求“文”而失“信”。梁代名僧慧远在翻译佛经时就非常赞同真谛的观点。

玄奘(602-664)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最伟大的译家之一。虽然在直译和意译问题上玄奘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看法, 但从其译文看他实际达到了将直译和意译完美结合的程度。他认为, “文”与“质”并无一定的标准, 直译与意译也很难作截然的区别。他还制定了“五不翻”的原则, 即用音译法翻译一些译入语难以表达的事物。直到当今, 玄奘在佛经翻译上所采用的灵活译法仍受到许多学者的高度评价。

(二) 圣经翻译与西方翻译理论

西方译学理论起源于圣经翻译, 从纪元初期直到今天, 圣经翻译从未停止过。西方的翻译史是在公元前3世纪揭开它的第一页的。从翻译发展史角度来看, 圣经翻译应视为西方翻译最初源头, 圣经翻译理论则成为西方翻译理论逐步发展成熟的原始依据。

收稿时间: 2008-11-30

作者简介: 牟晓芳, 女, 现为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李秀丽, 女, 现为山东广播电视大学外国语学院任课教师。

根据《西方翻译简史》，西方最早的译作是公元前3—2世纪，七十二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的《圣经·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这些学者翻译圣经时的立足点是译文必须准确，所以翻译出来的文本词语陈旧，有的地方译得直白僵化，甚至不像希腊语。这个译本为保持圣经原状做到了十分的准确，因此被教徒奉为经典译本并且在翻译史上有着特殊的位置。

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公元前106—43)是西方翻译史上第一位理论家。他主张译作超过原作，译者高于作者。他认为译者在翻译中应像演说家那样，使用符合古罗马习惯的语言来表达外来作品内容；直译是缺乏技巧的表现，应避免字当句对的死译；翻译应保留的是词语最内层的东西，即意思。很显然，西塞罗主张活译，反对死译。西塞罗对翻译理论所作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打破了翻译只限于实践，不过问理论的局面。特别是他提出的所谓“解释员”式翻译与“演说员”式翻译，即“直译”与“意译”两种基本的译法，确定了后世探讨翻译的方向^[3]。

从事圣经翻译最早的并以其理论著称于早期宗教界，包括翻译界的应数斐洛·犹太欧斯(约公元前20—约公元50)。他对翻译问题的阐释大致是：圣经翻译是神圣的，译者单凭精通两种语言而无神的感召，是不能从事翻译的。实际上坚持“受上帝的感召”是一种逐字逐句直译死译的作法，可在当时却因被不少人奉为圣经翻译的准绳而盛行一时。斐洛把译者变成一种“听写工具”，完全剥夺了译者的自主权。

哲罗姆(347—420)是早期西方基督教会四大权威神学家之一，他完成了第一部标准拉丁语圣经的翻译工作。在哲罗姆看来，虽然《七十子希腊文本》的译者“上帝的感召”，在用词方面是不会有上帝感召的，译者应当按照译文语言的特点移植原文的风格。他在这方面的理论可大致归纳为：翻译不能始终字当句对，而必须采取灵活的原则；应区别对待文学翻译和宗教翻译：文学翻译中，译者可以而且应当采取易于理解的风格转达原作的意义；但在圣经翻译中，则不能一概采用意译，而主要采用直译^[4]；正确的翻译必须依靠正确的理解。哲罗姆把直译和意译看成一种互补关系，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承认自己有时意译，有时直译^[5]。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充分地看到了翻译问题的复杂性。哲罗姆的翻译原则和方法，对后世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奥古斯丁(354—430)是罗马帝国末期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拉丁教义的主要代表，在圣经翻译上他同斐洛持有同样的观点，即圣经翻译必须依靠上帝的感召^[6]。他显然主张直译的方法，他这种忠于原文的直译法深深影响了后世的一大批译家，对后世的语言和翻译研究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二、中西方翻译传统的相似性

尽管西方的圣经翻译和中国的佛经翻译在内容、时间、

涉及的语言和社会历史背景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由这些宗教经典的翻译而引发的有关翻译理论的争论却显示出极大的相似性。

(一)以直译为主

无论是中国的佛经翻译还是西方的圣经翻译，最初所采用的方法都以近乎死译的直译为主：在中国，三国的支谦以前基本上都采取了直译的方法；西方最初的《七十子希腊文本》也以直译为主，另一位近乎死译的圣经翻译代表是斐洛。早期中西方翻译家在翻译各自宗教典籍时表现出来的相似点是，为避免在翻译中的主观随意，译者只好在词序和措词等方面采取死译，译者的任务是做到字字对译，丝毫不必顾及译语中的特殊形式和习惯。

在古代宗教翻译史上，中外译者之所以都以直译为主，有几个方面的共同原因。(1)语言功底的欠缺。当时许多主持宗教典籍翻译的译者可能不是专业译者，当他们在译入语中找不到原语的相应表达时，就采取保留原语语音甚至原语结构的直译法；(2)对宗教经典的虔诚态度。古代很多参与或主持宗教典籍翻译的人不仅是博学多识的学者也是对宗教虔诚的信仰者，他们的翻译实际上是为政治和宗教目的服务的，在这些虔诚的教徒眼中，宗教典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原文的每个字句结构都含有深刻的含义，这使得他们不敢在意义上稍有改动，否则便是对神灵的亵渎；(3)缺乏翻译经验。那时的翻译家无论是在翻译实践方面还是在语言掌握和运用的程度上都远远不够，他们很难正确判断在什么情况下应该采用直译法，什么语境中应当采用意译法，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直译就是对原作最忠实的翻译方法，而对意译往往是持谨慎保守的态度。

(二)倡导意译

随后的中西翻译学者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和翻译经验的积累，已跳出逐字对译的藩篱，而注重意义的整体传达，并不绝对排除意译。中国佛教翻译史上的四大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之一的鸠摩罗什是意译的代表，他主张只要不违背原意则不必拘泥于原文形式，此后的许多译者大都采用罗什倡导的意译法；西方在圣经翻译中多用意译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中世纪初期英国的阿尔弗里克(Aelfric)、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的伊拉斯谟(Erasmus)和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6世纪英国的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dale)和威廉·富尔克(William Fulker)等人。路德在翻译中遵循通俗、明了、能为大众接受的原则，注重再现原文的文学形式和风格。他认为，只有采取意译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再现圣经的“精神实质”。

中西方的宗教经典翻译开始以意译为主，其主要原因与翻译的目的和对象有关。他们的翻译对象都是普通大众，因而都采用人民大众的语言。翻译的目的是为了让教义被大众所理解，而不只是纯宗教研究，所以译文必须明晓易懂，直译是很难达到的。西方则更是因为受到人文主义

的影响和发展民族语言的需要。

(三)直译、意译协调统一

在我国佛经翻译史上,无论是从翻译佛经的数量还是从译经理论的贡献方面来说,玄奘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玄奘之前的佛经翻译都先按梵文逐字搬译,然后再按照汉语语法改写,最后由笔人润饰,其中或增或减,多失原意。玄奘则不然,因为他精通两种语言,又深通佛理,译时出口成章,只要记下来就可以了。在玄奘这里,文质之间并无截然之分,能直译时直译,能意译时意译。这是翻译经验的长期积累和对双语知识掌握提高的结果。

如果说西方的圣经翻译在16世纪之前还存在着直译、意译之争,那么到了17世纪及其以后,就不再强调是该直译还是该意译了。英国1611年出版的《钦定本圣经》(Authorized Version)是英国17世纪以至整个英国翻译史上最重要的译作。译文质朴、庄严、富于形象,韵律也饶有声韵之美,发挥了英国民族语言的特点,对英国散文、诗歌语言和文化的发展都发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总之,通过对比发现,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佛经翻译还是西方的圣经翻译,都经历了从直译到意译最后到二者圆满调和,或者说在翻译中不再强调该用直译还是意译的阶段。注重的是译文的准确传达和译本的可接受性。两种翻译原则交替主导翻译活动并逐渐趋于成熟直至二者最终有机融合的发展,体现了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是社会发 展规律作用的结果^[7]。

三、中西方翻译传统的差异性

尽管中西方宗教翻译活动在各自的历史演进和发展完善历程上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但由于佛经翻译和圣经翻译具有一些根本性的差异,从而使中西译本具有各不相同的特征。

回顾中西方各自的宗教翻译史,无论是中国的传统译

论还是西方的古代译论,都是渊源于佛经翻译或圣经翻译实践,依附于哲学—美学的发展而发展,佛经翻译和圣经翻译实践为中西译学提供理论思想以及演进、发展的原动力。然而,由于中西方的哲学—美学以及宗教翻译具有一些根本性的差异,从而使中西译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中国佛学强调“悟性”,重直觉体悟而不重逻辑推理,是内在超越,认为美是生活体验,美在现实中,无须外在的超越;西方神学则看重上帝的“感召力”,认为美不在现实中,而在彼岸世界,是一种超越的体验和创造。

所以,中国译学理论表达方式含蓄、模糊、非术语化,言简意赅但不乏真知灼见;而西方译学理论概念明晰、术语繁多、逻辑推理性强。这些主要特征对各自译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再加上中西译学理论分别根植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民族文化土壤不同,社会生态环境不同,中西译论因此有了不同的发展轨迹。

参考文献:

- [1]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23.
- [2]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41.
- [3]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5.
- [4]刘重德.文学翻译十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51.
- [5]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2-33.
- [6]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8.
- [7]骆乐.佛经翻译与《圣经》翻译中的直译与意译[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4):57-59.

O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Theoretical comparison of the Translation to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the “Bible”

MOU Xiao-fang, LI Xiu-li

(1.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2. Shandong TV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ng history of both the oriental and western worlds, the translations to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the Bible reflect their respective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wned by both sides. This paper tries to find out som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hidden behind the translation traditions of both parties through making a brief comparison on their translation theories as well as reviewing their religious translating history.

Key words: Buddhist scriptures translation; The Bible translation; Similarities; Differences